

中国商业文化简史,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,有很长的历史渊源。本书既按照时间顺序,梳理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脉络,又另辟蹊径,选取与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相关的代表人物——范蠡、卜式、李白、欧阳修、胡雪岩等——展开专题论述,从不同角度展现中国历史上的商业思想与消费状况。虽曰“简史”,举凡历史上和商业相关的货币、商品、人物、诗词、思想,本书都有涉及,堪称了解中国商业文化的优秀著作。

商业文化缘何而来

甲骨文中“文”字就像正面站立的人,胸口有一个交错的图案。这个图案可能是指文身,有的原始部落相信在身体上文特殊的图案,可以获得额外的能力。当然也有可能指衣服上的花纹,先民们的审美意识还不成熟,就算是衣服上的花纹,也不会纯粹是为了自己臭美、看着喜欢,而多半是某种权力、地位的象征。无论哪种意思,都强调“文”与图案有密切的关联,这应该是“文”最初的意思。其实当时的“文”虽然与图案有关,但多半不像美术作品那样讲究线条、比例、颜色、透视关系等,而是强调“杂”。《易·系辞下》里就这样写道:“物相杂,故曰文。”《说文解字》里也说:“文,错画也,象交文。”这是什么意思呢?大约就是指不同的形状或颜色混合在一起。最原初的“文”也许是大自然无意形成的。“风乍起,吹皱一池春水”,这湖面细细的波纹是不是“文”?这是“文”。“浓绿万枝红一点,动人春色不须多”,火红的石榴花点缀在浓郁的绿叶中,这是不是“文”?这也是文。这是我们说的“文”的第一个意思。

“文”的第二个意思是承接第一个意思而来的。石榴花也好,小池春水也好,所谓的“文”总能引起观赏者的愉悦感,这其实也是“文”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。自然界中由“杂”和“错画”形成的图案浩若烟海,它们未必都能成为古人视野中的“文”,而得到古人青睐的“文”,其实多半是那些看着顺眼的,或者至少是看着不讨厌的。研读古人留下的文字资料,我们发现古人在凝视某事物外在的“文”时,往往会引发对此事物内在价值的认同,我们认识“文”的本源意义时,一定要注意把握这一层面的含义。由此在古人的话语中,“文”除了让人视觉感知到美好的“杂”“错画”之外,还引申出一个与之相关的重要意义,即对自己心灵的修养,从而使自己体现出高尚、优雅的品格。这个专指心灵修养的“文”,恰好可以与“质”相搭配,指人之所以为人的两种不同的要素。《论语·雍也》里这样写道:

子曰:“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。”孔子说,一个人如果质朴胜过了文采,则像一个乡间的野人,啥都不懂;如果他的文采胜过了质朴,则像是衙门里掌管文书工作的人员,整天板着脸,乏味得很。只有质朴和文采搭配均匀、两相适宜,才是一个“君子”啊!“文质彬彬”,这里“彬彬”的意思是“物相杂”而“适均”之意。“君子”指道德高尚、有修养、“素质高”的人,古人觉得读书修身能做到“君子”的程度,那是非常不错了。如何才能达到“君子”的标准呢?第一个条件是“质”,“质”是“质朴”之意,进一步引申为人区别

于其他物种的天然“内在”,这种“内在”是不可能由后天修养而成的,说起来大约与遗传基因有关。第二个条件就是“文”,指人通过后来的修养,知书达理、明辨是非,行为合乎礼仪制度、伦理纲常。“文”虽然与“质”含义不同,但二者相辅相成,对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来说,二者缺一不可。如果一个人既有仁德善良的强大内心,行为举止又符合礼仪制度要求,在孔子看来,这样就可以算是一个“君子”了。举个例子,北京大学曾经有一只“网红”猫咪,此猫多年来混迹于各个教室,貌似认真地听了不少名师的课程,被戏称为“学霸猫”。不过就算它听再多的课,也还是只普通的小型猫科动物,无法“文”起来——它缺乏成为高尚、仁德之人的那种“质”,那种人类特有的基因。反过来呢,如果只有人之“质”,却不愿接受“文”的熏陶,放任自流、争名逐利,别说当不成“君子”了,恐怕连普通的人也做不成,比如说那些电信诈骗子、“女德大师”,其实还不如一只安静的猫咪对社会有贡献,白白浪费了一副人的好皮囊。

“文”除了与“质”相辅相成,构成“君子”的两大素质外,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意思,是指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,进而具体化为以这种符号为记录载体的文物典籍、礼乐制度等。我们或许疑惑,那“文字”与“制度”怎么就“进而”产生联系了?其实这种“进而”在古人看来是不言自明、水到渠成的。原来在中国春秋时代之前,学习、使用文字是一门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职业,普通老百姓是不具备这项特殊技能的。文字最初主要服务于政治生活,其用来表达思想情感、描绘文学想象,成为文学记录和传播的主要载体,说起来还是比较晚近的事情。《论语·子罕》有这样一段记载:

子畏于匡,曰:“文王既没,文不在兹乎?天之将丧斯文也,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;天之未丧斯文也,匡人其如予何?”

这里讲的是孔子当年被匡人围困时发生的事情。孔子这次遇险与他的长相有关。根据《庄子》《墨子》《荀子》《史记》等书籍的记载,再佐证以秦汉时代的石刻等材料,我们基本可以断定,孔子确实长得不够帅。但这次他在匡地倒霉其实并不是因为长得不好看,而是他不幸与一个叫阳虎的人“撞脸”了。阳虎是鲁国的实权派,他曾经压榨、欺凌过匡地百姓,匡人恨之入骨,错把孔子认成阳虎了。当时的情形十分危险,刀都要砍到脖子上了。但孔子怕吗?不怕。孔子非常自信,“文不在兹乎”。周公留下的礼乐制度、人群大道所寄正于此,我是要传之久远的,这是我秉承上天早已做好的安排。难道“天之将丧斯文”吗?如果

真是那样的话,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晓的“天”怎么会把“斯文”传给我呢?上天既然给了我传承“斯文”的使命,则区区匡地的几个老百姓又能把我怎么样?

孔子在这段话里说到的“斯文”之“文”,显然不是指文字,而是指周公所作的礼乐制度。在孔子看来,礼乐制度是维系周朝宗法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法宝。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“文化”之“文”,从事物外在的“错画”,到心灵的装点修饰,再到文字符号、典籍制度,看似一个简简单单的、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字,却有着如此深厚的文化内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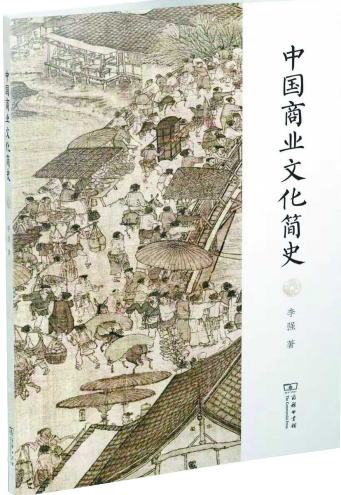
周朝初期的商业

周朝建立后,经商被当作国家重要的事务,朝廷进一步提高商业的地位,将之看作国家正常运转之必不可少的环节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里这样写道:

《周书》曰:“农不出则乏其食,工不出则乏其事,商不出则三宝绝,虞不出则财匮少。”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。此四者,民所衣食之原也。原大则饶,原小则鲜。上则富国,下则富家。

文中提到了四类人——农、工、商、虞,分别涉及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、林业(包含渔业)四个产业,显而易见,在周人看来,这四个产业是国家富足的基础,而且商业的地位一点也不比农业、林业差。《周礼》中规定国家“以九职任万民”,这“九职”中的第六个即“商贾”,其作用是“阜通货贿”。周武王将国家重要事务分了八项内容,即《尚书·洪范》所说“八政”:“一曰食,二曰货,三曰祀,四曰司寇,五曰司徒,六曰司空,七曰宾,八曰师。”这“八政”中排位第一的是农业生产,而第二位“货”就是商业贸易,其次序甚至排在了祭祀、外交、军事等国之大政前面。把商业与其他各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和国家重大事务相提并论,亦可想见当时人们对这一行当的重视程度。

商业不仅是朝廷重视的日常工作,如果遇到了不好的年景,它还担负着特殊的使命。周文王时曾遇到大荒之年,在他解决问题的众多方法中即有“招商商旅”,用当时的话来说,也就是所谓的“招商引资”。笔者记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,一些贫困地区的官员把“招商引资”当作脱贫致富的不二法门,只要能招来商人投资,一切都好说,生态环境、产业结构什么都不是问题。现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认识深入人心,地方在招商引资上也要挑挑拣拣了。不过不管怎么说,通过招商来提振自己的经济发展,这一妙招的发明权还属于周文王。(标题为编者所加)



《中国商业文化简史》
李强 著
商务印书馆

[作者简介]

李强

上海商学院教授,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,央视《百家讲坛》主讲人,华东师范大学博士,复旦大学、南京大学博士后,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。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。出版《宋真宗的1008》《大宋谜案》《红尘匹马长安道:中国商人往事》《红裙争看绿衣郎:大宋东京往事》等专著10部。

“文化”如今是个很时髦的词汇。“仓廩实而知礼节”,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较高程度,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会给人留下“买买买”的印象时,“文化”自然而然地成为影响我们进一步自我提升的关键因素。近些年来,市面上各种“国学”培训机构遍地开花,各路“国学大师”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,穿一件马褂就敢登上讲台讲述中华上下五千年,甚至有“妖孽师太”硬是把几百年前的“贞节牌坊”从坟墓里扒拉出来,死抱着它站在某大学讲台宣扬什么“女德”。在笔者看来,出现这种魑魅魍魉、乌烟瘴气并不可怕,“国学大师”再假倒也比“营销大师”“鸡汤大厨”更可爱些,他们有市场说明大众对文化知识有迫切的需求,几只苍蝇、蚊子挡不住我们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脚步。正缘于此,我们更有必要认真谈谈“文化”这回事。可是当我们讨论“文化”时,究竟在谈些什么呢?是“礼义廉耻”还是“贞节牌坊”?是“天人合一”还是“葵花宝典”?“文化”其实是个复杂的概念,这本小册子所有的篇幅都来讨论它也未够用。笔者在这里尝试采用最简单的办法,先来探究一下“文化”的字面意义。

“文化”的“文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?其实“文”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“纹理”,你把它理解成各种花纹也是可以的。

桂离宫,有关维修的学术工作

斋藤英俊

桂离宫御殿建筑群的大整修,从1976年开始一直到1982年为止,总共花费了六年的时间。当时,报纸等媒体将它称作“昭和大修理”。这次的整修工程距离桂离宫开工的年代,约有三百五十年之久。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,虽然也曾经进行过几次小规模翻修,但如此大动作的彻底整建还是头一遭,因而引来大众的瞩目。

当时,我以古迹修复专家的身份参与了这项工程,并且实际负责工程的设计管理与技术指导等工作。除此之外,维修工程进行期间,也同步展开调查工作,目的是为了了解相关的施工技法、材料构件的年代,以

及改造过的痕迹。因为如果没有将建筑物解体是研究不出这些资料的。这项调查就学术角度来说,可以算是意义重大,但同时判断于维修时的补强、尺寸的调整、花样的变更、材料的取代等,这样的工作也是必要的。

调查工作不仅止于判断柱子或桁上的卡榫是否是最初的产物,就连轻微的风蚀痕迹或是小小的刮痕,乃至于一个钉子所留下的洞,都必须滴水不漏地观察,反复推敲它所代表的意义。每天的工作,可以说都是不断针对拆解后的数千个构件,一一进行仔细的调查记录。在这本书中,有关御殿的营造过程与技法的解说,很多来自这些

调查工作的结果。

像桂离宫这样的建筑物,由于它的材料构件分得很细,细部又格外错综复杂,想要将它画成图像实在不是很容易的事。可是,穗积和夫先生却能把我提出的无理要求,利用适当的构图方式,转化成人人易懂的插画。另外,负责编辑的平山礼子小姐对于我老是赶不上进度的状况,也总是给予包容甚至是鼓励,同时她也在文章和插图的安排及内容方面,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。因此,本书的诞生必须归功于上述两位专业的协助,本人谨在此致上感谢之意。

(后记之二,标题为编者所加)



《桂离宫:日本建筑美学的秘密》
[日]斋藤英俊 著 [日]穗积和夫 绘
译者:张雅梅 译
上海人民出版社